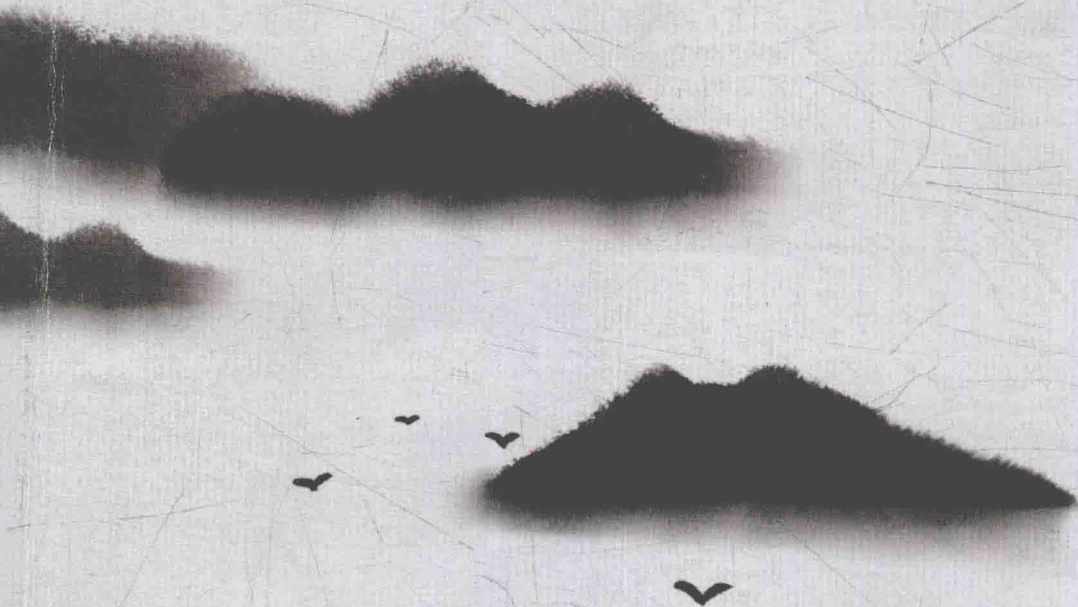


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

张保宁 主编

WENXUE
YANJIU
FANGFALUN
DUBEN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

张保宁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JC17N0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 / 张保宁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 1

ISBN 978-7-5613-8748-1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方法论
IV. ①I0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4213 号

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

WENXUE YANJIU FANGFALUN DUBEN

张保宁 主编

责任编辑 / 于盼盼 惠 雪

责任校对 / 于盼盼

封面设计 / 浥林品牌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陕西省富平县万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75

字 数 / 575 千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748-1

定 价 / 6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高等教育出版中心联系。

电 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64

学术:公私之间的天空

(代序)

陈 洪 孙勇进

陈洪(1948—),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校兼职教授;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李贽》《漫说水浒》《画龙点睛》《浅俗之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雪鸿閒辑》《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书话题》《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论读本》等。

孙勇进,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著有《中国小说通史》《漫说〈水浒〉》。

近读郭英德同志《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一文(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颇有空谷足音之感。1999年在一次会议上,我们曾谈及这个问题,认为“另一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似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的个人化。其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粱谋。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然申之未详,论之未彻。今得郭文,足畅怀抱,获益良多。

虽然,正如《倾向》一文所指出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既与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生活背景有关,也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故此,理或非一端。今愿就郭文所论,稍申管见,一则摇旗呐喊,凑个热闹;二则也可算是摆脱“独语”状态,体现“学术者公器”的一次实践。

欲认识、评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私人化”问题,必须联系近十余年来的思想文化走向,必须联系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就此而言,有两点特别应予注意:一是知识群体的“边缘化”,一是价值观与话语系统的“多元化”。

先说“边缘化”。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知识群体的“精英”意识与“担当”意识一度空前高涨。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间虽几经起伏,但启蒙的激情与干预的热望始终弥漫在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相伴生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中心化”心态。在某些时间段落里,知识群体似乎左右了社会舆论,而舆论也似乎认为他们领导了社会潮流,所以不少朋友“揽辔有澄清天下之意”。但是,在社会生活的更深层面,其实仍是“皮毛关系”理论在起实际的支配的作用。今天,反观当日知识群体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心相而已。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真实的权力格局像浪潮退去、泡沫消散后的岸礁一样呈露出来,朋友们蓦然发觉自己的立足处其实始终在靠近边缘的地带。于是,有人清醒而自我调适,有人失望而自我放逐。“荒江野老”之说遂不脛而走。这一群体性的心态调整方将进行,孰料新的更加强烈的震荡不期而至,这就是市场经济与深具市场品格的大众文化的急剧膨胀。虽然在 80 年代,相当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曾为之呼喊,曾为之翘首引领,但当它真的来了时,却发现这个禁锢在瓶子里的怪物对于自己实是一场噩梦。市场运作的趋利铁律与大众文化的浅俗保守,十分适宜于厌倦了意识形态神话与乌托邦故事的社会土壤,一下子便呈铺天盖地之势,而将人文知识群体彻底挤到了边缘。“教授卖馅饼”之类的闹剧虽不乏炒作的成分,但确实反映出经济生活变迁对知识群体社会角色的影响,以及所造成的这一群体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

在这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下,知识群体的角色挫折感空前强烈,于是重新进行地位判定与角色设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 80 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个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 80 年代理想化。其实就是放弃以至逃避参与社会事务和干预历史进程的责任。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无奈;而无论你把它看作选择还是无奈,其原因都是客观的“边缘化”的现实。

再说“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多元”都既是对抗“霸权”的一种策略,又是对现状的特定角度的描述。把范围缩小到国内,所谓“多元化”也同样表现为两种属性:一种是“边缘”群体的言说策略,一种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现状的描述。这样看来,近十年“多元化”之说不绝于耳,一方面与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知识群体有关,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思想文化变迁的新局。80 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人们“求新声于异域”,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一

股脑儿涌入。虽当时颇显芜杂、浅薄,但经过一番淘汰、沉积以后,各种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融渗到中国人(主要是知识群体)的思想/话语之中。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一趋势,都不能不承认它对知识群体的分化所起到的触媒作用,都不能不正视它所引发的文化共识、价值共约、释义通则等社会观念整合机制的危机。

群体的分化,共识共约的裂解,都给个体带来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伴生了“相忘江湖”式的冷漠。而话语体系的多元,则使个人自说自话成为可能。

指出上述两点,是想说明:1. 我们所讨论的学术“私人化”不是纯粹主观选择的结果,其间实有不可逃避的“运数”在焉。2. 所以,对这一倾向也不宜作简单的道义批评,而应进行历史的与逻辑的分析。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基于对此“运数”的清醒认识,一些学者自觉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方式。陈平原的言论最有代表性:“我们已经习惯于批评学者脱离实际闭门读书,可我还是认定这一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这一点中外学者的命运不大一样。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而王元化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史研究,则是调整之后的践履的典型。

这些学者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在他们看似淡然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厚人文情怀,也是不难体会到的。但是,“支撑起”的初衷却未必完全得到了实现。其原因有二:在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学术队伍的整体弱化;所倡导的新的学风在继武者那里的“橘化为枳”。可以说,同是“脱离实际”“纯粹书生”的旗号,在“边缘化”“市场化”的阵阵罡风吹卷之下,“高者挂胃长林梢,低者漂转沉塘坳”。“高者”,我们留待后面再说;而那“低者”所陷入的,便是过度私人化的泥沼。

实际上,过度私人化的问题,在学术以至文化的各领域都有表现。即以文学圈子来说,创作中的纯自娱倾向,批评中的找卖点倾向等,“私”的印记都相当鲜明。而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郭文已列举出不少,颇有先得我心者。这里再赘述几句,已示“化枳”之说并非危言耸听。

一曰只讲材料,拒斥思想。某些论著完全堆累材料,引枝牵蔓,不知伊于胡底,美其名曰“文史相证”,而对于古人的境界,今人的感受,一概没有兴趣。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出现了只讲“古典”,不讲“文学”,尤其不讲文学的人间情怀的怪现状。

二曰闭门造车,不问轨辙。若以数量论,90年代的古典文学论著相当可观;而若

以每个具体领域/问题的进展衡量,则与数量颇不成比例。“重复建设”“学术泡沫”之多,令人咋舌。即以金圣叹研究为例,十年间的论文百余篇,而八成以上是重复他人。其中固有不少捋扯、组装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闭门造车所致。对于这些作者(称“写者”可能更贴切)来说,写出来“发”出来便是一切,学术前沿、学科发展与己全不相干。

三曰无是无非,独善其身。与80年代相比,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商榷、驳诘明显减少。大家自扫门前雪,“公海”中的风浪一概与己无关。不但“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风范不再,就是学术会议上的正常讨论,也常常是自说自话。前两年,在古典小说领域,先后出现明显背离学术规范,甚至不讲常识的几种奇谈怪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轰动到名牌大学的讲坛。我们的专家大多以沉默表达轻蔑与清高,而任由弟子们享用歪理邪说。

四曰自视禁脔,排斥异己。某些领域,甚至某些问题,被我们的研究者视为自家园囿,凡涉足而不附己者,轻则侧目,重则大张挞伐,结果门户林立,边界森严,而在外人看来,却大有蛮触风味。如某显学,在作者祖籍、版本优劣、批点真伪、续作价值等等问题上,都有“划线”的问题。新老“权威”之间动辄要“控上法庭”,而一旦面对不识私界的闯入者时,又枪口对外,以远远超出学术范围的手段排斥之。

以上种种,皆因缺少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胸襟,又为一时社会风气所挟,杂以利益之考虑。郭兄文中所列,多从研究对象、研究路数着眼,这里则侧重于学风与学术态度,意在说明过度私人化是导致学界整体品格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

不过,“私人化”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高者”“低者”之分别。应该承认,陈平原当年陈述的学术态度,今天仍以智者的冷静足备一家之言。而回顾90年代的学术发展,在规范化、客观化以及深入求实方面的成绩,不能不说与这份冷静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是有鉴于此,本文说到“私人化”时,总要谨慎地冠以“过度”一词。这绝非持两端计,而是因为学术研究其实不能笼统地排除“私人”,甚至某种程度的“私人化”。所以,在如何评价一些带有私人色彩的个体化研究时,我们和郭文的看法稍有不同。

比如“小题大做”问题。9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界盛行“小题大做”之风,固然缺乏直接干预社会的力量,选题也不足以展现研究者的人文关怀,但作为学术研究,作为对80年代近于空疏的学风的反拨,自有其相对合理性。80年代是个文化人雄心万丈的时代,当时,如果你听到一个本科生宣称他正在建立自己宏大的理论体系,也并不会十分奇怪——盖风会所趋也。这种浪漫的学术激情固然有助于解放思想冲决网罗,但却不利于学术的正常积累和持续发展,连带着,其实也不利于思想的深化。因此90年代的学术研究由80年代的“宏大叙事”向“小题大做”转型,固然有时代思潮的原因,亦

有其学理层面的必然性。

郭文批评小题大做,还针对一种特定现象,就是有些研究者将沉寂了数百年的小作家、小作品拿出来研究,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在历史价值的筛子中,它们被无情地筛掉了,这正是一种历史的公正”。这一点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历史淘汰”这一前提恰恰是有些可疑的。人们首先会问,什么是“历史”?我们直接面对的是客观的历史事件,还是后人书写的历史文本?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警惕与这书写必然伴生的话语权力问题:一些作家、作品在书写中消失,有时是话语暴力的产物(现代文学史中的张爱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价值观不同的后人、现代人,未必会无条件地认同这种书写。因此所谓“研究历史淘汰的作家作品”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区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对话语暴力的质疑、抗争、颠覆,不论这种话语暴力来自当年大一统王权的强势话语,还是来自特定历史时期一元独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二是一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孤立地看确实有限,但钩沉这些被时光淹没的作家或作品,对填充某些历史环节,开拓学术领域,亦有积极作用,如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如对才子佳人小说、明代中篇文言小说、清代女性弹词的重新关注等;再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某些研究者出于不纯正的学术动机,对一些价值确实不大的东西,如某些艺术、思想价值均极低劣的小说,加上夸大其词的前言后记反复出版印行,进行学术炒作,在牟利的同时靠夸大其辞来放大自己学术研究的意义,这无疑是在“研究”私利化的表现。所以,对“发掘”“钩沉”现象,似以分别情况论之为妥。

再如郭文批评的“考据至上”“制谱成风”现象。这是否尽属消极的“私人化”,也有分说的必要。当然,近年的学界确如郭文指出的,更多的是仅视考据、制谱为真学问,为研究的终极目的,从而缺少宏阔的文化视野,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就一定不能转为思想的资源、社会批判的资源,就一定具有私人化的品性?只怕未必。一位研究者仅仅出于私人化趣味爬罗剔抉排比材料编订出的某历史人物年谱,被另一位深具人文情怀的学者用以考察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的变迁,进而反躬自照、思考现实,这在学术史、文化史也不是很少见的事。冷静客观的材料考证是进行人文批判的坚实的基础,否则,即使空有一腔人文关怀的热情,所论文采飞扬、激情澎湃,然皆凌空蹈虚,则不免为方家所笑(比如——扯得远一点,文化界热闹了好几年的学术随笔,余秋雨屡出硬伤,而另一好以此骂世炫学的作家,一篇小文竟出十余材料、常识错误,这样自然大悖文化批判之初衷)。

讲这些并不是要为“考据至上”“制谱成风”辩护,在基本立场上,我们完全赞同郭文的看法,即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应该有人文关怀。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它的性质从来包含两方面:一面是对逝去的世界的研究,带一点知识考古的意味,但另一面,面对文学的文化的对象,研究者不能没有人文关怀、甚至人文激情。“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这一点,没有深沉的关怀怎能和古人对话,又怎能向今人阐说?因此,即使是以冷静的态度进行材料的研究,也以具有文化的担当精神为上乘。只是考虑到情形纷杂,故稍呈异议以示方便法门。

四

郭文力图匡矫时弊,提出的问题是每个关心古典文学学科、关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朋友都不应漠视的。我们确实应该提倡学者的人文情怀,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内部。从整体而言,我们决不能选择对社会“心远地自偏”的态度。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我们都不能做此选择。应该承认,在此社会转型时期,在世界性的消费文化大潮中,中国的人文知识群体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扮演唐?吉珂德。但是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破罐破摔”。如果我们以冷漠报复社会,社会必将以十倍的冷漠来回应我们所钟爱的学科。相信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情景。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学术,特别像古典文学这样的学科,天生就有一定的“个体”品性。无论研究者的工作方式,还是对对象的体味、感悟,都具有相当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当我们说“人文情怀”时,所提倡的与古人心灵沟通,其实也是研究者个体的伸张。所以在批评某种消极的“私人化”学术态度时,切忌笼而统之,以免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这一点,在当下尤须强调。因为多年来,一统、一元的话语模式至今余威尚在,相当多的研究者终生笼罩在“部颁教科书”的阴影里,循着极为相似的思路,讲着同一风格的语言。在汗牛充栋的“成果”中,欲觅几个新鲜、生动的面孔,往往须“众里寻他千百度”。更何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品格,更是知识群体中的稀缺元素。

当我们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时,着眼的主要是其“求真”的品性——无此品性,学术便无存在的价值;当我们追求个性化的学术时,着眼的主要是其“爱智”的品性——无此品性,学术便无鲜活的魅力。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实在是具有“公私兼顾”的双重品性。在双重的品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力之所在,即为活力之所在。反之,则难免于孤阴不育、独阳不蕃的枯寂。

之所以强作解人,附郭文之骥尾,实出于一种渴望,渴望看到建构于“公”“私”之间的那片湛蓝而辽远的学术天空。

(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目 录

第一单元 思想篇

- 002 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 / 毛 莉
- 013 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 / 陈晓明
- 018 文艺理论的创新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 王元骧
- 030 建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文艺理论家董学文访谈 / 金永兵
- 038 与季羨林先生对话中呈现新思想 / 王岳川
- 048 “文须有益于天下”——文艺理论家徐中玉访谈 / 王聪聪
- 053 文艺理论要为文学创造思想——文艺理论家钱中文访谈 / 丁国旗
- 062 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况——文艺理论家鲁枢元访谈 / 刘海燕
- 070 在历史的喧嚣中坚守学者的精神立场——文学史家丁帆访谈 / 王 昉
- 079 批判性思维与思维基本功 / 谷振诣
- 087 思考与讨论

第二单元 视野篇

- 090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 叶舒宪
- 096 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去世 70 周年的回顾 / 钱理群
- 110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 王富仁
- 121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 / 尚永亮
- 123 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 温儒敏
- 137 “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 王晓明
- 145 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 / 陈思和
- 149 乐黛云:从世界的文学视野看中国比较文学 / 褚国飞
- 156 “文明冲突”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 曹顺庆 王敬民
- 160 视觉图像文化及其当代问题域 / 金元浦
- 165 思考与讨论

第三单元 治学篇

- 168 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之启示 / 胡守为
- 171 功底与眼光——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漫谈 / 莫砺锋
- 179 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 葛晓音
- 194 文坛马帐传薪火,身教言传岂畏劳——霍松林教授访谈录 / 刘锋焘
- 207 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 马自力
- 219 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文艺理论家王先霈访谈 / 熊元义
- 227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 严家炎
- 238 杨义先生的小说史研究 / 赵稀方
- 250 一个符号学者的“自小说”——赵毅衡教授学术生涯访谈 / 邓 艮
- 257 文字·文学·文化·思想——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 / 黄新炎
- 269 思考与讨论

第四单元 方法篇

- 272 如何把“死”知识变“活” / 朱光潜
- 276 钱锺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 杨 绛
- 279 批评的尊严——作为方法的丸山升 / 洪子诚
- 287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 陈平原
- 293 创造性批评:解说与解读 / 徐 岱
- 302 实证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三种模式 / 陶东风
- 307 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 / 赵宪章
- 317 分析美学:方法、模式与历史 / 刘悦笛
- 326 言语视角:一种可行的新诗阐释途径 / 罗振亚
- 330 谈谈学术研究方法 / 佚 名
- 335 思考与讨论

第五单元 经典篇

- 338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 张岱年
- 344 《红楼梦》评论 / 王国维
- 357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鲁 迅
- 365 略论中国韵文起源 / 钱 穆
- 371 谈新诗 / 胡 适
- 383 经典常谈·文第十三 / 朱自清
- 393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 宗白华
- 402 中国诗与中国画 / 钱锺书
- 419 说意境 / 叶 朗
- 426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 童庆炳
- 430 思考与讨论
- 431 编后记

第一单元 思想篇



当代文论重建路径： 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

毛 莉

张江(1956—)，广东梅州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西方文论被全面、系统、细致地引介到中国，西方文论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在大量新奇概念和范畴的挤压下，中国文论产生了“失语”的焦虑，“话语重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大关切。

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如何重建当代文论？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了有力质疑。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他提出“本体阐释”的建构思路，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画了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

近日，张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论述了“强制阐释”及“本体阐释”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采访在张江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记者看到，在并不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书籍。每本都夹贴着不少各类颜色的便签，记录着他的心得和思考。张江毫不讳言要“用强制阐释论的全新眼光重审整个当代西方文论”，判断它的价值。他伫立窗前，望着长安街上的滚滚车流说，生活向前进，理论必须向前进。

一、“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新判断

1. “强制阐释”有四条话语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观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流派繁多，更迭迅速，气势浩荡，但没有一个学派最终形成完整的体系。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和不足，国内一些学者有了一些警悟和反思，但多是针对某个学派或学说的具体观点而言，没有抓住西方文论的要害。

张江：你说得对，很少有人对当代西方文论做总体上的客观评价。20 世纪的西方



文艺理论,与此前的古典文论和近代文论相比,尤其是在学科独特性的探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但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文论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仅仅是一条摸索、尝试的轨迹记录,有诸多缺憾和局限。例如,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等。

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叫新的判断和认识?大彻大悟吗?请您先把“强制阐释”阐释一下。

张江:先说一个例子,简单明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曾用数学的方法,设立了叙事学上著名的“符号矩阵”: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可以将其内部元素分解成四项因子,纳入这个矩阵。矩阵内的四项因子交叉组合,构成多项关系,全部的文学故事就在这种交叉和关系中展开。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曾用这个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鸽鸽》进行解析。

《鸽鸽》的大意是讲一个养八哥(鸽鸽)的人,没有回乡的路费。八哥便出了个主意,让主人将自己卖给王,骗钱到手后,八哥和主人在城外会合,双双逃离。杰姆逊先是找出故事里的基本元素:鸟主人(X),买鸟者(反X),八哥(非X)。根据格雷马斯的要求,这个矩阵必须是四项,这第四项让杰姆逊颇费周折,最后苦心定义为“人道”,由此再做深层解析。杰姆逊说,这个故事探讨的是如何解决人道与独裁统治冲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故事原本简单,笑的就是王的愚蠢,鸟的下作。但杰姆逊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让人匪夷所思。这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2. 文学理论无关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让您一说,就成了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这个判断可以推广到一般吗?

张江:是的。这是当代西方文论诸多流派的通病。一些重要的流派和学说,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许多概念、范畴,甚至是认知模式都是“拿来”的。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当代文论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愈深愈重,模仿、移植、挪用,深刻改变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生态。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姿态和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但同时也证明,当代西方文论自身的创造力衰弱,理论生成能力枯竭,难以形成从文学和文论自身成长过程中凝聚和提升的场内理论。近百年来,新旧理论更迭淘汰,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文主义到科学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无数场外理论的侵入和张扬,当代的文论统合图景却总是活力与没落并行。这已充分证明,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救不了西方文论面临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话是有道理的,场外征用的现象在西方文论中比比皆是。弗洛伊德、索绪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这些原本并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学者,其理论也被扯向文学理论。我好奇的是,非文学的理论是以什么手段被转换为文学的理论的?

张江:这里的办法很多,技巧也很高超,但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策略。

一是,话语转换。为贯彻场外理论的主旨诉求,将批评对象的原生话语转换为与场外理论一致的话语,可以称作“再生话语”。这个再生话语既不是文本的原生话语,也不是文本创作者的主旨话语。为适应场外理论的需要,征用者暗调主次,置换话语,将批评主旨锁定在场外理论的框架之内。

二是,硬性镶嵌。使用场外理论的既定方法,将批评对象的原生结构和因子打碎分割,改变其性质,镶嵌到场外理论所规定的模式和程序之中,以做出符合场外理论所需要的判断和认识。

三是,词语贴附。将场外理论既有的概念、范畴、术语直接贯注于批评对象,仿拟一种专业语境,做出文学本体以外的评述。这里“贴”是粘贴,意思是将场外理论的术语粘到批评对象上,达到与场外理论上的表面相似。这里的“附”是附加,指的是将场外术语注入批评对象,使批评对象依附于场外理论获取疏离于文本的意义。

四是,溯及既往。以后生场外理论为标准,对前生的历史文本做检视式批评。无论这个文本生成于何时,也无论文本自身的核心含意是什么,都要用后生的场外理论给予规整,以强制姿态溯及既往,给旧文本以先锋性阐释,攀及只有后人才可能企及的认识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概括的这几条在概念上的切割是清晰的,但抽象的专业术语流水一般涌现,让人理解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能不能用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说明白?

张江:那就用生态理论的一个批评文本为例。《厄舍老屋的倒塌》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描写了一个古老家族的一对孪生兄妹住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幽暗古屋里,妹妹疾病缠身,哥哥精神几近分裂,妹妹病笃,哥哥活埋妹妹,妹妹破棺而出,死在哥哥怀里,哥哥吓死,古屋在风雨中倒塌。

这原本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在这篇小说出版 100 多年后,生态批评理论对其进行另外的阐释:首先是话语置换。小说原本讲的是人和事,无关生态与环境,但批评者却把原来仅作为背景的环境描写置换成主题,将小说变成一个生态学文本。其次是词语贴附。把文本中散在的情境描写集中起来,连缀演绎为生态符号。比如,古屋不是房子,而是能量和熵;古屋倒塌是宇宙黑洞收缩;主人公的生活是一个星球的日渐冷



却。再次是硬性镶嵌。按照批评者的需要,把精心挑选的意象镶嵌到整个生态理论的图谱中,最终完成对原有文本的重构和改造。小说诞生时,还没有出现生态理论,生态批评者却用当下的认识对前生的文本进行强制规整。这就是溯及既往。

这种脱离文学经验,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的做法,其直接后果是: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文学充当了其他理论的佐证工具,文学学科特性被消解,由此,我们当然质疑,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现在的疑问是:场外征用有它的弊端,但是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文学征用场外理论难道不是正当的吗?

张江: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

20世纪末出现的索卡尔事件就很有意思。有人把它归结为文学理论史上十件大事之一。索卡尔是物理学家。他杜撰了一篇“诈文”,投给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没有发现索卡尔有意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轰动。索卡尔写这篇“诈文”的目的是对文学理论界,尤其是法国理论界,包括像拉康、德里达这样的大师,对数学物理学成果的滥用表达不满。

文学不是数学、物理学,它是人类思想情感心理的曲折表达。人类的主观特性不可能用统一的方式去预测规定,因此才可以有文学。用数学物理方法规范文学没有道理。

文学理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应该积极鼓励,但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离开这一点,一切理论都失去生命力。

3. 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分析可以看出,场外征用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用预先确定的模板框定文本,用前在模式去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张江:这指向了“强制阐释”的第二个话语特征:主观预设。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

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哈姆雷特》的阐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女权主义的视域中,文学史必须重写。一切形象、故事都要纳入女权主义的框架。尽管《哈姆雷特》全剧20幕中只有5幕出现一个配角奥菲丽亚,她和哈姆雷特的爱情也只由几个模糊的倒叙提起,但出于女权主义的前在立场,奥菲丽亚必须被视为“悲剧的中心”,以往所有被忽略的细节,都要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加以阐释。奥菲丽亚头戴野花具有双重象征,花本身,意蕴着处女纯洁的绽放;花是野花,象征妓女般的玷污;她溺水而逝,是因为水是女性深刻的有机符号,女人的眼睛常常深浸着泪水。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



女性批评要证明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以至于在文学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是被男权主义所蹂躏所侮辱的集体。但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以立场的需要解读文本,其过程难免强制,其结论也一定是远离文本的结论。

张江:的确如此。如果批评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确定,批评的指向就不在文学和文本,而在表达和证明立场。文本是脚料,文学是借口,批评只是凭借文学的历史深度证明立场正确,凭借文学广泛生动的本征,增强立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阐释的立场、结论当然要有,但这一切都只能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后。

4. “强制阐释”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上面说的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值得讨论?比如论证的方法。

张江:当然有,尤其是逻辑论证上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个案举证。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做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

二是循环论证。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

三是以假说证实。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

5. 反序认识路径违背认识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文论表面繁盛无比,但理论的有效性却不断衰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张江: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论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其认识路径出现了混乱。首